

王爾敏著

晚清商約外交



道堂

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專刊(十四)

晚清商約外交

王爾敏 著



中文大學出版社

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設計、編輯及製作，並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。

© 香港中文大學 1998

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。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，不得在任何地區，以任何方式，任何文字翻印、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。

國際統一書號 (ISBN): 962-201-846-7

出版：中文大學出版社

香港中文大學 · 香港 新界 沙田

圖文傳真：+852 2603 6692

電子郵遞：cup@cuhk.edu.hk

網址：http://www.cuhk.edu.hk/cupress/w1.htm

The Diplomacy of the Commercial Treati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during the Late Ch'ing Period (in Chinese)

By Wang Erh-min

©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1998

All Rights Reserved

ISBN: 962-201-846-7

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

Sha Tin, N.T., Hong Kong.

Fax: +852 2603 6692

E-mail: cup@cuhk.edu.hk

Web-site: http://www.cuhk.edu.hk/cupress/w1.htm

Printed in Hong Kong.

劉白如先生序

師大校友王爾敏君新撰《晚清商約外交》一書，送來稿本，問序於余，謂四十餘年來，雖不乏著作，惟此篇最具自信，固不敢云獨步史壇；然亦願能不辱師教。余非治史專家，但觀其廣羅中外資料，申論史實經緯，紬繹紆曲，時中肯綮，在在展現其史學才識。其四十餘年來辛勤追求學問之成就，至感欣慰。

猶憶民國三十九年爾敏就讀師大史地系時，余方接任校務一年，學校創立未久，規模初具，諸待擘畫。惟余堅信師資之充實，應為治校之首務。於是乃多方禮聘名師宿儒，來校任教。即以史地系而言，所聘著名學者則有沙學浚、郭廷以、王益崖、洪紱、孫宥越、王華隆、鄭資約、王德昭、朱雲影、曾祥和、李樹桐諸先生，此外並邀請史學名家如姚從吾、勞榦、張貴永、藍文徵、陶振譽、吳俊才等來校兼課。當時在台之史地學科知名學人，可謂網羅殆盡。故能締造濃厚之學術風氣。蔚為一時之盛。

爾敏篤實好學，潛沉精進。自出校門，即始終追隨郭廷以先生研治中國近代史，所著專書約十餘種，而編纂資料工具之書十三種，計三十餘冊。所撰史學論文更在百篇以上。四十餘年來，專心致志，孜孜不倦，用能獨擅一代史乘，而蜚聲士林。爾敏為人木強厚重，摯愛師友，硜硜自守，不染浮華，惟學術是問。其莊敬貞定珪璋特立之志節，足為實踐師大校訓「誠正勤樸」之楷模。

余恆念前輩史學名家，或早已作古，或退隱林泉，今爾敏瞻懷師教，矢志歷史學術之發皇，以答諸師長諄諄垂教之恩。當茲

校園師生倫理日趨衰微之際，實令人有空谷足音之感。爾敏此書之出版，益見其史學造詣之深厚，余讀後無任佩慰，爰誌數語為序。

劉 真

民國八十六年三月

唐德剛先生序

——讀王爾敏著《晚清商約外交》的心得和感想

我們對中國近現代目錄學有興趣的朋友們，大致都不會否認一個現象，那就是國人以漢文治國史最弱的一環，便是近代中國外交史。筆者本人甚至不知輕重大放厥辭的說過，若論在外交史上的成就，中文著作中，簡直沒一部可讀之書。這雖是個人不學而又長個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亂語。例如數十年老友王爾敏教授這本新著《晚清商約外交》便是一本極為可讀之書。但在下這句信口之言，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內外教書經驗的有感而發，因為我們在外國大學裡教授中國外交史（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），或東亞國際關係史一類課目的參考書目(syllabus)中，有時為文化自尊心所驅使，實在想列入若干「中文著作」以光門楣，但是有時除一些史料書之外，勉強列入的中文著作，實在有違心願，其原因就是，你把勉強選入的書目，和同一類的西文書目並列，二者之間的功力與火候，是不能相提並論的。就談晚清外交史吧，有哪一本「中文著作」和摩爾斯那三大本的《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》相比，不是個娃娃呢？

再說摩爾斯的學生費正清罷，在費氏大旗之下，哈佛一校就出了數十本具體而微的類似著作。不談觀點，只從治學的功力與火候來比較，至今的「中文著作」裡，還找不到幾本火候能與他們相提並論的鉅著，這樣一比，我們要想劍橋學派，在晚清外交史這一行道上，不稱王，不稱霸，又豈可得乎？這兒還想大膽的插上一句，在這個劍橋學派裡，縱是亞裔學者，所持的觀點，也是費正清的觀點。雖然費氏逝世之後，這一觀點已逐漸淡化了。

若問，在這一行道上，中英兩文的著作，距離何以如此之大

呢？筆者的回答，便又要回到我個人的老「主義」上去了。首先，這是個歷史轉型的問題。學術轉型原是社會轉型的一部份，我們要知道，外交史，國際關係史這一行道裡的學問，在我國的傳統史學，所謂六家二體裡，都未嘗成過專業。尤其是所有外交家，都應有若干修養的國際法這一門，它和我們整個傳統法家一樣，發育始終沒有成熟，在中國學術史上，就像一個花苞，花未盛開，就枯萎了。何以如此呢，那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的了。下節當略述之。

再者，筆者在談比較史學，尤其是談比較文學，和比較藝術時，總歡喜勸搞「比較學」的朋友們，比較要分「階段」要古代比古代，中古比中古，現代比現代，才見高下。不能囫圇吞棗說，中國音樂不如西洋音樂，中國詩歌不如西洋詩歌，或中國小說不如西方小說，……你只能說現代中國的音樂，遠不如現代西方音樂，你可千萬不能說，中國唐代的音樂比不上中古時期歐洲的音樂，因此我們談國際關係史，乃至國際法這行學問，也是一樣。在傳統中國，我們在這個專業裡，就比西方落後了，落後到幾乎沒有了的程度，但是它在先秦時代的發展，卻也曾大有可說，甚至還有更高成就呢。吾人試讀我國古籍中的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、乃至《晏子》、《管子》，便知道我們的成就，不在西方之下。但是在秦漢以後就不足觀矣。且舉幾則小例子：

我國古代國際公法的萌芽

在春秋戰國時代，我們的老外交家管仲（？—公元前645年），做了齊國的周恩來。以國務總理，兼外交部長，幫齊桓公打天下，搞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」（不正是美國今日所幹的？）為維持他那時的國際和平，管仲於公元前651年，在齊國的葵丘（今山東省臨淄縣），召集了一個國際會議，並簽訂了一件國際條約叫做〈葵丘之盟〉。（這項條約如簽訂於二十世紀，周恩來顯然就要選日內瓦或萬隆了。）在這件「葵丘條約」裡，當時各列強，在齊國（位

同今日的老美)的操縱之下，歃血為盟，宣佈一致遵守所簽訂的各條款，這些條款當然也就變成當年的國際公法了。原條文是假當時有名無實的「周天子」之名(也就是今日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之名)，向國際公佈的。條約的內容是：

毋雍泉，毋訖糴，毋易樹子，毋以妾為妻，毋使婦人與國事。

(見《春秋穀梁傳》，僖公九年)

這則我國古代的國際公約，大致也可叫做「五毋公約」或「五禁公約」吧。今天讀起來雖覺可笑，現代女權主義者讀來，尤其要怒髮衝冠，但是這卻是那時最合實際需要的國際條約。(請看今日聯合國中由美國帶頭所搞的「禁核」、「禁武」(化學武器)等等三禁，五禁諸條約，就可知道其重要性也。)在公元前七世紀的黃河，淮河和長江流域，小國甚多。一河流經數國，如果上游國家築壩蓄水，下游國家就要受旱災了，所以不能「雍泉」(截流，築壩，或造蓄水池)。飢荒缺糧時期，各國尤不許囤積居奇，所謂毋「訖糴」也。「毋易樹子」這條也很重要。由於往古部落之間通婚的老傳統，我國封建時代王族婚姻都是有國際背景的。直至今日我們還有「姻聯秦晉」的成語。乖乖，秦晉都是超級強權。他兩家的外甥少爺已經做了「樹子」(太子)，你要把他換掉，代以小老婆之子，豈不要引起國際糾紛？為著國際和平，則樹子不可易也。

小老婆決不許做大夫人

「毋以妾為妻」，也要寫入國際條約。朋友，你認為是笑話嗎？非也。不但那時是事關世界和平的大事，縱在今日二奶也不能代替大奶呢。不信，您如試想美國柯林頓大總統，今日要和喜拉蕊離婚，而把蒙妮珈·陸文斯基(Monica S. Lewinsky)扶正作美國第一夫人，你看今日世界會變成個什麼樣子？首先華府和北京的「伙伴關係」，恐怕就很難繼續了。國會內極右政團，如乘機要

罷免這位好色的總統，則老美現在在波斯灣，和在咱們的海峽兩岸，所發生的作用，也就要完全改變了。「以妾為妻」在今日尚可生若是之紕漏，況兩千五百年前之東亞大陸乎？所以他們要在國際條約上，明文規定，諸位元首可以搞三宮六院但不能搞以二奶代大奶。

(筆者附注：據說彭德懷在打完韓戰歸來，立刻就以國防部長身份，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團。他的理由是，「今天還能搞三宮六院？」這就是彭張飛，不如周管仲了。須知，咱中國從君主轉民主，這個「轉型」，還沒有轉乾淨嘛。我們的主席，至少還是半個皇帝，甚或是一個半皇帝呢。皇帝猶存、你彭老總怎樣「躡等」去廢除帝制政體中最重要的制度，所謂三宮六院呢？……試問那個有權力的大男人，包括柯林頓總統，不想搞三宮六院，其不搞者，是不能也，非不為也。可憐的是猛張飛不明此轉型之道。他這位可敬可愛的「彭大將軍」，後來竟至不能善終，讀史者悲之也。)

至於不許女人參政，在今日是很違反潮流了。可是縱在今日，也還難免要有個「但書」呢。像今日台灣的女強人呂秀蓮，和陳文茜。她們特立獨行，寧願犧牲婚姻和生男育女，也要搞政治。女各有志，實在是令人脫帽致敬的。但是若有女人，先要搶個強人丈夫，然後再挾丈夫令諸侯，狐假虎威，橫行天下，像江青和(林彪的老婆)葉群那樣，就不足為訓了。甚至在女權高漲的今日美國，大有野心的喜拉蕊，不能隨心所欲的去搞政治，還不是國會中人討厭她妻假夫威，來亂參國政。喜夫人今日對個好色的丈夫不嫉不妒，也是為了她自己的政治前途，而向國會內的大男人主義者，忍痛犧牲呢。所以我國古代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，管夷吾(仲)，就要策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，立法禁止「婦人與國事」，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
晏大使不入狗門

我國古代的齊魯地區，除出了些了不起的聖人之外，也出了些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。後來晏子(名嬰字平仲，?-前500年)

為齊相，也是個周恩來，以宰相兼外長，他甚至親自出馬做大使，報聘各國呢。這時齊已日衰，而楚正崛起。出使楚國，工作也不太好做，《晏子春秋》裡就有一段晏子使楚，因為他和鄧小平一樣，是個小矮子，楚國人想羞辱他，反而被晏大使所辱的小故事，也頗足一述。先讓我們來讀讀他的「古漢語」原文，（青年讀者們，也不妨順便練習練習，讀讀所謂「諸子百家」的老古董，並不太難嘛。）《晏子》原文如下：

晏子使楚，楚人以晏子短，為小門於大門之側，而延晏子。晏子不入，曰，「使狗國者，從狗門入，今臣使楚，不當從此門入。」賓者更導從大門入。見楚王，王曰，「齊無人耶？使子為使。」晏子對曰，「齊之臨淄三百閭，張袂成陰，揮汗成雨，比肩繼踵而在，何謂無人？」王曰，「然則何為使子？」晏子對曰，「齊命使，各有所主。其賢者使使賢主，不肖者使使不肖主，嬰最不肖，故宜使楚矣。」

（見《晏子春秋》，內篇雜下，第九章）

再以白話重說一遍：晏子出使楚國，楚國人因為他是個小矮子，乃把大門邊上裝了個小門。要晏大使從小門進去。大使不入，說，「我出使的國家，如果是一個狗的國家，那我就從狗門進去，但是今天我是到楚國來出使，楚國人並不是狗，我也不應從狗門進去。」招待員不得已，乃改請大使從大門進去。楚王一看大使其貌不揚，就說，「難道齊國就沒有人了嗎？為何要派你這樣的人來做大使呢？」晏子說，「敝國人可多呢。單是臨淄一城，就有三百個社區。熙熙攘攘的大街之上，大家把袖子一舉，便全城遮陰；大家如把頭上的汗抹下來一甩，就像下雨一般。哼，怎能說沒有人呢？」楚王說，「齊國既然有這麼多的人，為什麼把你派出來？」晏大使說，「大王有所不知。敝國派出大使是有一定規格的。最像樣的一等人才，就被派到最像樣的一等大國。我晏嬰原是敝國最不成樣子的外交官，所以才被派到楚國來，也是應該的嘛。」

這時楚國正力爭上游，志在爭霸，兩國冷戰正烈。作為駐楚特使，時時都有受辱的可能。一次楚國警總抓了個強盜，說是齊國人，楚王乃問晏大使說，「齊人固善盜乎？」這就引起了晏子所說出的中國文學裡，那段有名的成語，叫做「橘生淮南則為橘，生於淮北則為枳」。晏子說，民生於齊，不盜；入楚則盜，是你貴國風氣太壞啊？他原是齊國的良民，一到楚國就變成強盜了……真是難為了，晏大使的好口才。

握手風波和季辛格的中國飯碗

上述這些故事可能都是真的，因為在冷戰之中辦外交，不論古今中外都是不容易的啊。一個外交家，在執行其外交政策之外，他平時在折衝樽俎之間的急智，也需有特殊的天才呢。近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中，周恩來總理，便曾向美國國務卿杜勒斯，伸出手來，並叫聲Good morning啊。誰知杜勒斯這個老帝國主義者，竟拒不伸手。在這情況之下，周公的手如何收回？所幸周恩來應付這種場面，也有他的天才，和晏子一樣，終能化險為夷，其後國際外交圈，提起此事，未有不罵杜勒斯是老混賬的。後來季辛格於1971年，第一次秘密訪華時，就為這個「握手問題」，傷透腦筋。他深怕，「萬一我伸手，他（老周）不伸手，如何是好？」（見《季辛格回憶錄》：白宮時代，及《尼克遜回憶錄》，1972年，頁559。）

其實，季辛格此人，還是外交訓練不夠。你在來華之前，就應該把「周恩來此人」搞清楚嘛。古人（陸抗）說，「豈有鳩人羊叔子哉？」今世又「豈有不伸手之周恩來哉？」相反的，老周在見到季氏之前，連他在哈佛的博士論文，都查了個一清二楚呢。如此，你這個小孫行者怎能跳過周老佛爺的手掌心呢？所以周公有生之日，季辛格始終是周門之中，為他服務的美國博士呢。季博士，老實說，也樂此不疲。至今對北京仍忠心耿耿。何也？君不聞，蘇秦窮困時回家，「妻不下織，嫂不為炊」的故事嗎？等到他佩了

六國相印，再過家門時，「妻嫂側目不敢仰視，俯伏侍取食」（爬在地下侍候取點東西吃）。蘇秦笑問嫂嫂，「何前倨而後恭也？」嫂嫂掩面低聲回答說，「還不是因為小叔今天做了大官，有錢有勢嘛。」（見中華版史記蘇秦列傳頁2262）蘇子「頭懸梁，椎刺股」，苦學成名，所為何來？還不是為著今天嗎？

我們的季辛格先生，也正是如此呢。筆者在美國教書，就是從最慘的紐約市大，夜校成人開始的，授課時間是晚間七至十一時。一天工作之後，疲憊不堪言狀。因此在這樣的課室中，老師固然很慘；工讀的窮學生，尤其可憐。季辛格早年就是一個來歐洲的小猶太難童，白天在小商店記賬，夜間在紐約市大成人班的會計專修科上學。

那時的季辛格，便和早年的蘇秦一樣，是個「妻不下織，嫂不為炊」的窮光蛋。直至二次大戰後，他領了退伍軍人獎學金，才從「窮人的哈佛」（紐約市大的諱名）轉入富人之哈佛，去「頭懸梁，椎刺股」，讀其博士的。他其後風雲際會，差不多都是替周恩來工作的結果。離開了中國這一行，季辛格就不是季辛格了。飲水思源，能不肝腦塗地？朋友，蘇秦張儀服務的對象，原是沒有國界的。出生德國的猶裔季辛格，他能替尼克遜服務，他也可替周恩來服務啊。搞外交如用兵，也是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周公得之也。所以不才總歡喜說，近百年中國史上只出了兩個半外交家。周恩來和李鴻章兩個之外，顧維鈞算是半個。而這兩個半外交家，也只有顧維鈞這半個，算是科班出身。李周二公，皆出身行伍也。顧維鈞雖是外交界的科班出身，也只是個洋科班，威靈頓（Wellington是顧的洋名字）離家上學之後，未進過一天中國學校也。李周二人，雖是純國產，然如上節所述，國營企業中無此行道也。他二人搞的，可說是百分之百的天才外交和常識外交（commonsense diplomacy）。搞常識外交，天才外交，已不足取，他二人再加上各自有個無知而好權的主子，強不知以為知，橫行霸道，他二人搞外交，不但要外御列強，還要內說昏君。能維持個

敗而不亡的局面，就很難能可貴了。悲夫。

中國古代外交建制的轉型

以上所舉的一大堆，從古到今的外交小掌故，無非是想說明：(一)我國古代的外交學是很不平凡的。舉凡今日西方所發展的，各種涉及國際關係的概念和實踐，我國古籍中，無不行行具備。專司外交的行政機關，在政府建制中的地位也至為崇高。用句現代話來說，那便是，不是首相兼外長，便是外長做首相(美國的國務卿，便是這樣的)。那時搞外交的人，也是國際間的寵兒。蘇秦就是一人兼六個國家的外交部長，「佩六國相印」的，這在人類的外交史上，顯然也是一樁「金氏紀錄」也。

不特此也，甚至二十世紀才出現的「國際聯盟」(The League of Nations)和「聯合國」(The United Nations)組織的構想，在我們的戰國時代亦已萌芽。他們那時觀念中所謂「尊王攘夷」中的「王」，基本下便是列強表面上一致擁護，而事實上由幾個爭霸的大國所支配的國際組織，所謂「挾天子以令天下」(《戰國策》秦策一)是也。君不見二戰前的「國聯」之中，五十個國家被英國牽著鼻子。和今日的老美，動不動就打聯合國的招牌，向世界各國頤指氣使？伊拉克的胡賽茵，現在挖了幾十個洞，還是怕藏身無所；中國的江澤民，向那位好色的小總統不斷陪笑臉，還不是怕他挾天子以令天下(按：無論見之於《戰國策》、《新序》以至乎《史記》，均曰：挾天子以令天下。)，今日的錢外長還不是以一侯之下，萬侯之上的低姿態，對霸主的波斯灣政策，微笑，鞠躬，說不。

可是(二)，我國文明在秦始皇統一了東亞大陸，廢封建，立郡縣之後，建立了人類歷史上，第一個空前絕後的「宇宙大帝國」(Universal Empire)，這也是蒙古種黃種人所建立的東方文明的「第一次大轉型」。一轉百轉，往古列國並存，一強稱霸的世界秩序(World Order)不存在了，春秋戰國時代，所慢慢發展起來的，外交制度也就隨之迅速轉型，而面目全非了。

(筆者附注：在大秦帝國統一東亞大陸之前，人類歷史上只有個亞歷山大所建立的馬其頓帝國差可與之相比，但是亞歷山大一世而斬。他也沒有創造出一個宇宙帝國的規模與制度。秦之後的羅馬帝國自然也是個宇宙帝國，可惜它在公元476年亡國之後，便永不再來。其後西方的帝國建造者，便再也沒有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」的觀念了，後來日不沒的大英帝國，大則大矣，然非宇宙國家也。)

只有理藩院，沒有外交部

因此在我國的歷史傳統裡，秦漢以後的帝國時期，就只有內交而無外交之可言了。我們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內，九卿六部，百制皆全，就是沒個「外交部」。為應付周邊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國，歷代也只設了個不同名稱的「理藩院」，以司其事，但是「理藩院」只是禮部之內的一個司局級的組織，一切事務都當作「內交」來處理，而非「外交」也。例如西漢初年，中央政府與都城設在番禺（今廣州）的南越王國的關係，費正清主編的《劍橋中國史》，便說那是大漢帝國的「外交關係」(Foreign Relations)。(見該書第一卷第六章有中文譯本)筆者處理這問題則認為那是個「內交關係」，是東北張學良和南京蔣介石的關係。今日西方學者和政客，也認為北京和西藏的關係是foreign relations，說是中國佔領了西藏，西藏應該恢復獨立，云云。

耶魯哈佛和合縱連橫

北京的外交當局，明知是洋人藉辭搗蛋，但諸大臣為著自衛，卻只能支支吾吾，搞他個口齒不清，講不出令人心服口服的道理來，其所以然者，第一便是，你如果也以「現代觀點」和「現代西方人」，耍電子遊戲，你就得服膺他們的遊戲規則(Play their game according to their rules)。你既然不能放棄你自己，傳統的麻將規則，卻又要打他們的沙蟹，那就柄鑿不投了。有時你縱有天大的公理，也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講不清。例如，你如不搞計

劃生育，像毛主席說的「人多好辦事」，那你豈不是第三世界以農民為代表的愚昧無知？但是你如大搞其一胎制，「打」掉無數可愛的嬰兒，那你豈不更是殘酷野蠻，沒有文化。總之在「光榮，偉大，正確」的美國國會中，你反正永遠是不對的就得了。

朋友，您說美國政客嘴尖皮厚，無理取鬧的幼稚可笑。咱們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，還不是一樣的，甚或有過之呢。政治就是政治嘛。那個政客不嘴尖皮厚？再者搞現代外交，是全國人民的事，包括擔柴賣漿，甚至阻街女郎，都有其共同語言，外交家不只是政府的發言人，也是他們老百姓的發言人（英國就是如此）。至少，搞外交是個大行道，大專業，專靠周恩來，李鴻章一兩個人的天才，搞他個常識外交，天才外交，總歸不能抗戰到底的。要打毛主席所說的「持久戰」，那你就得有個永恆的，專業的Think Tank（智囊）。二十世紀的美國外交官，差不多都出自耶魯和哈佛的幾個教室，甚至是那幾個沙發之上。從西部起家的，那位唱戲的雷根不信邪，他要找幾個「西部專材」，來反外交托拉斯，搞得灰頭土臉之後，始知反托拉斯之不易也。朋友，托拉斯，鬼谷子，都不是好東西也。秦始皇以後，我們還不是反了兩千年。不幸今日我們又回到「戰國時代」。（抗戰期間雷海宗等幾位教授就自稱「戰國派」，並且出了一本雜誌叫《戰國策》，曾被老共恨得牙癢癢的。）在舊劇重演的戰國時代，再來搞他個「合縱，連橫」，就要倚賴耶魯哈佛的Think Tank底長期演練了。專靠毛主席英明偉大的「反智主義」(Anti-Intellectualism)，難免就走投無路了。

也談談西藏問題

再回頭談談西藏問題。筆者不學，關於西藏問題，我個人倒覺得達賴喇嘛並沒有搞分裂，達賴認為他和北京的關係，仍是domestic relations（內交關係），不幸達賴所採取的，只是歷史主義的觀點，和實用主義的觀點；筆者則覺得，他還要加一個「後現代主義的觀點」(Post-Modernist Approach)，就好了。此話怎說呢？原

來在「後現代階段」(也就是下一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吧),「兄弟民族」之間,為著互通有無,互利互保,是愈來愈團結的,而不是愈來愈分裂的。把原先團結在一起的兄弟民族,加以拆散,讓他們互爭互鬥,好讓鄰居來混水摸魚(fish in the troubled water),像今日的波斯利亞,甚或伊拉克和科威特,那是帝國主義幹的,也是違反世界潮流的。

君不見目前留在歐洲的歐洲人,正在大搞其「共同市場」(Common Market),和「歐聯」(European Union)?歐聯各國的大教授們,彼此之間要恢復用拉丁文通信呢。他們不是正在大搞其書同文,車同軌,行同倫,政(軍)同制,幣同值,教同經嗎?他們也不是正在設法恢復「羅馬共和」(Roman Republic)嗎?那比「羅馬帝國」(Roman Empire)還要老一輩。(羅馬帝國約同於我們的後漢;他們今天要恢復「前漢之興隆也」)美國人現在不是正在幫助他們擴大「北約」(NATO)嗎。這簡直是在實行諸葛孔明的理想呢。

再看看目前在美洲的歐洲人,所謂「歐裔美國公民」(European-Americans)和白的像一床被單似的「歐裔加拿大公民」(European-Canadians,同時我們也得知道,加拿大是今日全世界,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)。他們不是完全混合,成為一個嶄新的,稱雄世界的「英語民族」(English-Speaking People注意不是Peoples)了嗎?現在北美的美,加,墨三國不也在搞三國經濟共同體了嗎?我們應該知道,「後現代」電腦化了的西歐和北美,他們的書同文之「文」,決不是「拉丁文」,而是「英文」呢。

美國史上光亮輝煌的所謂民族「大熔爐」(Melting Pot),也只是對「歐裔美國公民」說的,不是對其他族裔說的呢。我們亞裔且慢在自己臉上貼金。對歐裔來說,那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確,他們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熔於一爐了。但是「歐裔美國(和加拿大)公民」與非歐裔的通婚率,卻不到百分之一呢。因此在「後現代的世界」(World of the Post-Modern Era)便會出現的一個橫跨大西洋,講英語的「純白人民族主義」(Pure White Nationalism)或「亞理安民族

主義](Aryan Nationalism)。這個新興的亞理安民族不是二戰前那個印歐民族主義(Indo-European Nationalism)。那個老主義是有「反猶」(Anti-Semitic)屬性。那也是它最後失敗的致命傷。

今後這個「亞理安民族主義」則是囊括猶太的。「歸化猶裔」(Assimilated Jews)將是它組合核心之中，極重要的成員。這個不聲不響的，新的民族組合，目前正在迅速成長之中。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後，會排山倒海而來的。因此，在後現代的世界，稱王稱霸的，可能還是他們，除非其他所謂「有色人種」(Coloured Races)能迅速的急起直追，團結自救，否則今日世界上的「低頭之犬」(under dogs)，到那時還是無抬頭之日也。

(筆者附注：在公元四到六世紀之間，我國的五胡亂華時代，也曾有過類似的現象。五胡亂華四百年也是個東方各民族的一次大熔和，使一個古老的漢族增加了新血液，而發生了返老還童現象(renovated)，乃出現了隋唐大帝國的鼎盛時代。目前這個從美開始的英語民族的新亞理安民族主義，正是一樣的。不可小視也。)

所以我們亞裔學人，如無視於這一歷史上不可避免的新發展，而跟著「歐洲中心主義者」(Eurocentrists)，去胡吹什麼「中國威脅論」，或自命清高，去反對什麼民族主義，以及去亂搞點什麼「中國也可以說不」一類小兒科的宣傳，都是「吠非其樹」(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)也。

朋友，他們應該反對的，不是我們那個可憐巴巴的中華民族主義。把十二億華裔受盡百年屈辱之後，所發生的一丁點兒的望治之心，看成今後的「黃禍」(Yellow Peril)，老爹，稱有心肝的華裔知識份子，何忍出口？在「後現代」的世界裡，朋友，我們的中華民族主義，恐怕還不夠資格當「黃禍」呢。替那個不聲不響的，卻排山倒海而來的「新亞理安世界秩序」(New Aryanized World Order)，做點未雨綢繆的制衡工作，才是我們在新世紀的當務之急呢；而這項工作，筆者不學，恐怕也正是我華裔不可自棄的發展